

人 格 课

人格素质包括：独立人格，主体意识，自我实现，个性解放，尊严，宽容，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人权意识，公民意识。

坚守你的高贵

◆ 游宇明

三百多年前，建筑设计师克里斯托·莱伊恩受命设计了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他运用工程学的知识，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巧妙地设计了只用一根柱子支撑的大厅天花板。一年以后，市政府权威人士进行工程验收时，却说只用一根柱子支撑天花板太危险，要求莱伊恩再多加几根柱子。

莱伊恩自信只要一根坚固的柱子足以保证大厅安全，他的“固执”惹恼了市政官员，险些被送上法庭。莱伊恩非常苦恼，坚持自己原先的主张吧，市政官员肯定会另找人修改设计；不坚持吧，又有悖自己为人的准则。矛盾了很长一段时间，莱伊恩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在大厅里增加了四根柱子，不过这些柱子并未与天花板接触，只不过是装装样子。

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秘密始终没有被人发现。直到前两年，市政府准备修缮大厅的天花板，才发现莱伊恩当年的“弄虚作假”。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国的建筑专家和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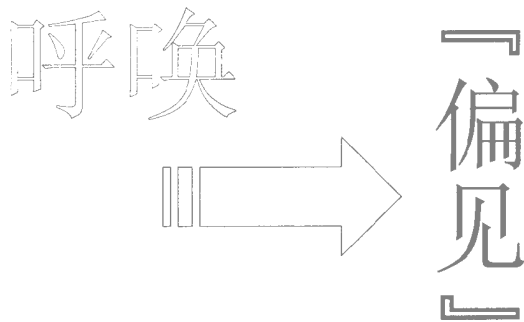
云集，当地政府对此也不加掩饰，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特意将大厅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外开放，旨在引导人们崇尚和相信科学。

作为一名建筑师，莱伊恩并不是最出色的。但作为一个人，他无疑非常伟大，这种伟大表现在他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原则，给高贵的心灵一个美丽的住所，哪怕是遭遇到最大的阻力，也要想办法抵达胜利。

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是他于 1941 年到 1943 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 (NOBLE) ——高尚的人。吴敬琏指出，当代大学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21 世纪的有用人才。



◆ 郭宗明

徐悲鸿大师的画室里挂着一幅自书的对联，八个大字，道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偏见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褒义词，实在应该树立起她的光辉形象来。因为，没有偏见就没有思想，没有偏见就没有文章，没有偏见学术的生命就会窒息，没有偏见，一个社会定然没有活力。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实际上都是偏见之间的争鸣。论争起来，不光论点，连态度都很激烈。墨子讲兼爱，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论战嘛，一般都会把自己的论点张扬得过了点儿头，而把论敌的论点攻击得过了点儿火。如果一味温良恭俭让，说“我的观点嘛，也不是绝对正确。你的观点嘛，也有一定的道理……”那还争鸣个屁！真理是在争鸣的过程中前进和发展的。人类的一部思想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争鸣史，一部各持偏见史。老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偏不倚，说到底大大的良民的不是。

鲁迅一生，最恨的是“折中，公允，调合，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 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人。他管这类人叫“骑墙派”叫“叭儿狗”。林语堂曾不遗余力地倡导“激烈思想”，提倡“偏见”，他说：“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种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他认为“只有偏见才有价值，别的都是贩卖、借光、挪用。”

钱钟书先生也有过一番精彩的“偏见论”，他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出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就是偏见。”“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提倡“偏见”的。一个偏见受压抑的社会必定是没有希望的。“偏见”不能得逞，真理也被阴霾遮蔽。让报刊杂志上那些不疼不痒、四平八稳、让人无精打彩的议论尽量少一些，让有价值的偏见来得更猛烈些吧！



◆黄玉鹏

常听周围几位朋友诉说，其志不在本职，但几经请调，未能如愿。于是，颇有怀才不遇之感。这样的例子，社会上恐怕为数不少。

生才贵适用，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是“用才”的含义是什么？章士钊先生在《甲寅杂志存稿》中，有几句启迪心扉的论述：“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有一分之才，务得一分之用”。换言之，所谓用才，一是被用，二是自用。

被用，自不待言。但如何自用？窃以为自用，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善于从不利中找出有利因素，坚定目标，矢志不渝，终必有成。人们常说的“岗位成才”，既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行行出状元”，又指人才的“自用”或曰自我发挥。例如，酷好诗文，可勤耕砚田；擅长书画，则可铺纸挥毫；有音乐“细胞”，或研究乐理，

谱写新曲，或弄吹弹拨、引吭高歌……只要乐此不疲，扬己所长，即使“岗位”不理想，亦能大展鸿图。事实证明，很多人才都不是在“合适”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倒是逆境、困难和曲折，促使他们的才华脱颖而出。

才贵适用，然而更重要的是人贵自用。

大学的力量

一百多年前，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校园南墙外是一个贫民窟，治安环境十分不好。于是，校方决定在南墙外修一道围墙，将学校与外界隔离开。可事与愿违，治安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经过如此反复几次，校方发现围墙这种“封校”的做法根本没有效果。于是他们推倒围墙，长年累月地向社会各界开设免费课程。这种开放的效果出奇地好，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赞扬，而且南墙一带很快成为哈佛最活跃和治安最好的地带。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这就是大学的另一种作用（黄建林）

最后的话

◆ 刘燕敏

内德·兰塞姆是美国纽约州最著名的牧师，无论在富人区还是贫民窟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一生一万次亲临临终者的床前，聆听临终者的忏悔。他的献身精神不知感化过多少人。

1967年，84岁的兰塞姆由于年龄的关系，已无法走近需要他的人。他躺在教堂的一间阁楼里，打算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一本书，把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死亡的认识告诉世人。他多次动笔，几易其稿，都感觉到没有说出他心中要表达的东西。

一天，一位老妇人来敲他的门，说自己的丈夫快要不行了，临终前想见见他。兰塞姆不愿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妇人失望，在别人的搀扶下，他去了。

临终者是位布店老板，已72岁，年轻时曾和著名音乐指挥家卡拉扬一起学吹小号。他说他非常喜欢音乐，当时他的成绩远在卡拉扬之上，老师也非常看好他的前程，

可惜 20 岁时，他迷上了赛马，结果把音乐荒废了，要不然他可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现在生命快要结束了，一生庸碌，他感到非常遗憾。他告诉兰塞姆，到另一个世界里，他决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再给他一次学习音乐的机会。兰塞姆很体谅他的心情，尽力安抚他，答应回去后为他祈祷。并告诉他，这次忏悔，使牧师也很受启发。

兰塞姆回到教堂，拿出他的 60 多本日记，决定把一些人的临终忏悔编成一本书，他认为无论如何论述生死，都不如这些话能给人们以启迪。他给书起了名字叫《最后的话》，书的内容也从日记中圈出，可是在芝加哥麦金利影印公司承印该书时，芝加哥大地震发生了，兰塞姆的 63 本日记毁于火灾。1972 年《基督教真理箴言报》非常痛惜地报道了这件事，把它称为基督教世界的“芝加哥大地震”。兰塞姆也深感痛心，他知道凭他的余年是不可能再回忆出这些东西，因为那一年他已是 90 高龄的老人。

兰塞姆 1975 年去世。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圣基督画像的后面有一只牛皮信封，那里有他留给世人“最后的话”。兰塞姆去世后，葬在新圣保罗大教堂，他的墓碑上工工整整地刻着他的手迹：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上将有一半的人成为伟人……

另据《基督教真理箴言报》报道，这块墓碑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块带有省略号的墓碑



◆莫小米

有一位同事美丽而又文静，说话语速总是慢慢的，音量总是小小的，但很能说到人的心底里去，你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她看穿的。

她的业绩说不上傲人，但也无可挑剔；她嫁了相爱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她不要求孩子学这学那，双休日一家三口就去游玩；她每天都要午睡，每天都做健美操，生活很有规律；她从不嫉妒荣誉加身的同事，也从不鄙薄偶尔犯错误的同事，只对势利小人冷目旁观，却也不恼，她觉得他们不会有好的心态与好的结局；她心明如镜绝顶聪明，与周围一些拚尽全力却活得七上八下不尽如意的人相比，我总觉得她的人生本来还可以更为出彩，而她没有去做。

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两两相对，她说起她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她的人生，读初中时她体质非常弱，任何体育活动都没法参加，学习又非常争胜好强，偶尔有一门功

课得不到第一就会难过就会自责。父亲说：以你的条件，你不必追求优秀，但你可以做到良好。她很听父亲的话，比较轻松地将每门功课都保持了良好，同时她的体质也恢复到了良好的状态。高中毕业她给自己的定位是考上一所普通大学，压力不重反而发挥良好，她轻松地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时她选择了中等城市的专业对口单位，她只求离父母近些，可以互相照料。她娓娓地讲述着这些，就如她不急不躁地构筑她的美好人生。

良好人生不被小说家与剧作家看好，因为良好人生不能构成他们的创作素材，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事业有成而家庭破裂，辉煌的阴影里藏匿着堕落，幸福来临却紧随着死神，有一项优秀就总有一项不及格。

生活何尝不是同样地乖戾，倘若某个人的某个单项特别优秀，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项目，缺憾往往也特别大。或者是，正因无可弥补的缺憾，才发愤地去追求优秀。

所以良好人生的境界实在已经至高。当一个人的事业、爱情、品行、心境乃至体格都能达到良好时，谁说那人生不够优秀？

泰戈尔的一句诗

◆ 章 红

“我不能选择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 泰戈尔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它曾经一直伴随着我，激励着我。有谁的成长不包含着痛楚与无奈，不夹杂着孤独与茫然失措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蝉蜕，我们在心灵上历经磨难，渴望脱茧而出，幻化成翩翩彩蝶。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能变成的，不过是一只灰扑扑的蛾子。这种对自己的不信任感使我们备感煎熬，使成长的痛苦变得更加尖锐。泰戈尔说，“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人生有多少东西是不能选择的呵。我们无法选择出身、财富，我们可能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聪明、美貌，我们也不一定会拥有好运气……我们惟一有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努力完善自己，始终不放弃自己，让自己变得好一些、更好一些！直至有一天，那“最好的”主动走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我选择了你，因为这是你应该获得的。”

尽管有鸟笼 我们仍要飞翔

◆朱永榜

什么是个性，“慷慨者逆音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惠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可谓是个性的真实写照。

千人千面，芸芸众生中，个性使“我”得以存在，个性的自由发展也一直是时代进步的表现。许多年来，先辈们一直孜孜以求，努力探寻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光明坦途，无论是先秦的“诸子争鸣”，还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因崇尚个性和民主而闪现出耀眼的光芒。综观历史，有许许多多极富人格魅力的人物，让我们不能忘却，无论是愤世嫉俗、洁身自好、常驾牛车访山问水道穷则大哭而返的魏晋“竹林才子”阮籍，还是高呼“上帝死了”的哲学大师尼采，或是勇于“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民族脊梁鲁迅，都以其极富张力的个性及在纷繁的社会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而令后人熟识并敬仰。

诚然，个性的张扬有一个“度”的问题。现实中，“木秀于林，行高于众”，其结局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比如梵高、尼采，皆因背弃或脱离社会，最终为世人上演了一幕撼人心魄的悲剧，对此，我们除了沉默和警醒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既是自我，亦是社会的一员，因此人的个性终究脱离不了外在环境的牵连。就我而言，由于过多地受文学的熏陶，人世多年来，一直改变不了耿直、执著甚至有些桀傲的个性，因而总在这个崇尚圆而非方、中庸而非激进的社会中四处碰壁。在工作上，自学完成大学学业的我，对事业抱有无比的热忱和期望，无奈个性的冲突及各种“关系”的束缚，至使自己一再遭受冷落，吃堑之后的我不得不把台板下的“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愔愔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的座右铭换成“这是一个整体协作的年代，对抗是无意义的，适应和创造才是强者的作风。”不知此举是睿智的选择还是自我的妥协。与我境况相当的还有一位朋友，曾相当信奉“尼采哲学”，大学毕业后，意气风发，激进放达，最终因个性所致，在单位的一次影响甚大的集资纠纷中成为“出头鸟”而遭“击毙”，被辞退后，他曾辗转反侧，奔波多年，但一直无所建树，后来在一家合资企业落了脚当了一名技术员，日子很平淡，再见到他时，已一反常态，表情谦恭而带几分木然，当时看到其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人总是要死的》，感觉颇为沉重。

种种先例表明，有时候是需要个性作出妥协的，尽管这有些残酷，它需要我们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气度和勇气。

在此，我不由地想到一幅漫画：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身外是一只被人提着的鸟笼。题语：“其实我们的空间是那么狭促，它供我们翻身，不许我们折腾，它供我们浅飞低翔，但阻碍我们飞入更高的夜空。”

其实，进步的社会不应是制约个性发展的樊篱，那种束缚个性发展的鸟笼是应该冲破的。看看我们的身边，那些越来越备受家长和社会“呵护”的独生子女们，其性格的健全及生存、竞争能力正愈加地受到怀疑；那些吃惯了集体的“大锅饭”的人们，在面临变故遭遇下岗之后，因个性及自我能力的匮乏，而不得不陷入嗷嗷待哺的窘境，以上种种，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个性与外在环境的冲突是难以彻底避免的。“或者被更高的事物拽着，或者被风拽着”，尽管有鸟笼，但我们仍要飞翔。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 蔡元培



讲给 大学生 听的故事

◆ 中 跃

这个故事是雪丽老师讲给我听的，不过我得承认，我没有听懂。

当时我们一起在办公室里吃午饭。大学里第四节课最难上了，雪丽咽下一口饭说，今天上到 11 点半的时候 学生就有点坐不住了，我就给他们讲了个故事。雪丽说，你不晓得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教室里多安静，那些大学生的表情是多么认真……雪丽说着自己笑起来。

我说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村子里……刚说到这里，底下的学生就发现了破绽：“你们那个村子？”我忙改口……是我小时候下放的那个村子。你看，他们比听课时聪明多了。说着她自己又笑了。

那时候大概是 1975 年吧，我下放的那个村子里，有个地主的儿子，此人 20 来岁，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看上去挺英俊的。我常常看见他站在我们村口那个池塘边上，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长时间地朝远处望，或者仰头朝天上的